

当年那只《纸老虎》

写给中国的读者们

□(法国)奥利维埃·罗兰

我曾经是毛主义者……在45年以前。说毛主义，至少我们曾经相信过。我参加的那个小组织叫无产阶级左翼 Gauche Proletariat，简称GP，它是个奇怪的混合：它多少有些斯大林式的手段和也许可以称为无政府主义的哲学思想。和我们一起的有工人，但我们大多数是年轻知识分子，我们拒绝接受那个“看家狗”的未来（请允许我在这里引用法国作家保罗·尼赞的散文，他在二战初期死去，当年我们都阅读他）。我们那时候反对“崇拜书本”。我们相信文化革命意味着持久地反抗所有的权力，质疑所有的等级，我们认为对抗共产主义制度里的官僚主义这是绝对地最受大众欢迎的武器。我们那时很天真，年轻是会这样的，经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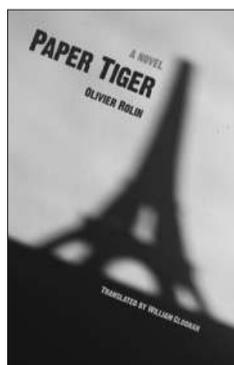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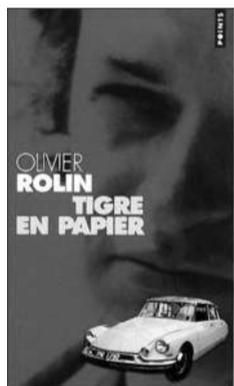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富有的法国，我们进行着暴力的

非武装的游击战。没有一天不发生公开的战斗。但是，我们跟那个时期意大利和德国的极左翼小组织不一样，我们禁止自己开枪杀人。这是我们最主要的智慧，它毕竟不是轻薄的智慧。现在，这段历史在我自己眼里几乎是难以置信的。我们已经到了做祖父母的年龄，我们的孩子们，孩子们的孩子们，他们怎么能理解它呢？但是我相信一个作家是可以起作用的，特别是：把正在消失的事用生动的回忆保存下来，告诉现在的人们过去曾经是怎么形成的，今天是在怎样的废墟上建立的。在这段历史过去三十年后，有一天我跟自己说，我应该试着用小说来讲述它，为了我们的后人。所以，《纸老虎》是给一个年轻女子讲述往事，一个像我这样年纪的和我相像的男人讲述往事给自己死去的朋友的女儿。我用这样的形式，也因为我是一个爱女人的男

人，这不是胡乱吹嘘，而是因为我相信：文学写作有一部分能源是从欲望中汲取的。

《纸老虎》发表在2002年。小说以自由的方式记叙了从68年到73年间我曾经积极参加的那些事件，我的叙述没有太远偏离现实。那是一场冒险的生活（其实我们很可能喜欢《水浒传》里那些绿林好汉的日子，如果那个时代我们读过那部小说），其中既有博大的理想主义，也有无知的教条主义，我们想为人民服务的英雄主义意愿曾经把我们置于可笑的境地。我们想当老虎，但我们是纸做的。十年过后，孟涓做了翻译，使这本书来到了全部故事的出发地（当然很大程度是想象的）。对于经历过真正的“文化大革命”并饱经苦难的中国读者，发现一下他们在遥远的西方在那些年轻的怀抱激情的精神世界里曾经引发多少魔光幻影，这也许是有意思的。

奥利维埃·罗兰(1947~) 法国作家，已出版小说、随笔等作品近20部，是1994年的费米娜奖和2003年法兰西文化奖的得主。在法国1968年学生运动中，他曾指挥左派的一支武装力量进行街垒战。



上起依次为《纸老虎》的法文、西班牙文、英文版封面。

这本书原只想记录世纪初那几年间，我/我们一家人与所际遇的猫族的故事。



新京报插图师春雷

台北流浪猫传奇

《猎人们》新版序

□朱天心

这些猫族，全是陆续捡拾来的街头孤儿，有些是正哺乳的猫妈妈出去觅食遭遇不测（通常是车祸或被狗咬死），或在资源有限之下猫妈妈狠下心淘汰舍弃的。我们遇到了，无法像诸多人采取的态度或劝告我们的“人都活不下去了还管猫”、“这是大自然的机制，别介入吧”……给他们一条活路。

我们与它们共处一屋檐下，各自独立，从不妄想将之视为一己的宠物或禁裔。

日日目睹他们成长、盛年、老去、离开……猫生中的精彩、困顿，我总不免好奇到心切他们的妈呢？与他们必定一样神秘有趣的手足下落如何？在街头还混得过去吗？所以自然爱乌及乌地寻到它们当初被捡拾处，开始一日一次的喂食、将生养不息又下场不佳的妈妈带去绝育。

此种以绝育取代大多数国家、城市采用的“捕捉扑杀”对待流浪动物，不谋而合其实是一些欧美城市已行之有年的人道、文明也有效控制数量的方式。

渐渐地，我们早不只在我们的里弄这么做，我们也说服并与台北市政府合作推动“街猫TNR计划，T(trap)、N(neuter)、R(return)，捕捉绝育放回之谓。目前的台北，已有近三分之一个市区已改弦易辙这么做。

这，重要吗？

我以为重要透了，因为若我们

习惯以清除垃圾的态度对待有生命的“无用之物”，早晚，资源匮乏时，我们一样会以此态度对待“无用的”（无力缴税、只占用社会福利）老人？残疾？工伤？穷人？……剥洋葱似的一层边缘弱势或非我族类。

残酷是轻易可养成的，同样，同情心亦非不能培养练习，究竟，我们打算向下一代展示示范哪一种对生命的态度呢？

所以，这不只是一本只写家中那几只可平安终老的可可爱猫族的书，也不只是写家门前几条巷弄街猫的书，它妄想写下在人类占尽一切资源的世界里试图生存的猫族的生涯处境（甚至传奇），最终，它也许不过想见证它们的匆匆来去一场。

真的是匆匆短暂，才不过五六年，书中写过的街头的猫已改朝换代不止几番，家中的猫，也又多了好些少了几只，包括那“只要爱情不要面包”，把我当同族的“辛辛”，今夏某日（其实我记得太清楚了，八月十三日）出门再没回来，我和天文翻江倒海寻它十几天，仿佛大病一场。

这是在中国内地出版的我的所有作品中我最在意能否出版的书，因为它记录了曾经我们一代之人摸索前行、试图找出一条如何文明地对待流浪动物出路的努力。缘此，也妄想它或有机会提供经验给“在路上”的内陆。也许，一切原本再简单不过，简单如印度圣哲地早在半个多世纪前说的“一个国家的强盛和道德程度，端看它如何对待其他生灵”。